

贵州“屯堡人”的社会认同机制研究

黄星尧,吴文馨,卢云峰

摘要:“屯堡人”的社会认同兼有“原生”与“建构”两种面向,它既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力量形塑,也与个人的自身境遇与文化策略密切相关。论文以社会认同理论对这一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作三个层面的机制分析。首先,“屯堡人”这一分类框架是政府、地方精英与学界共同塑造的产物,在不同的个体境遇中有差异化的呈现。其次,在与周边族群的社会比较过程中,“屯堡人”通过修族谱等方式,不断修正着内群的相似性要素与族际间的差异性要素,从而动态地维持着自身的族群边界。最后,通过在宗族组织中建立“军裔联盟”“屯堡网络”等团体,“屯堡人”以积极的内群区分提高了群体的自尊。

关键词:社会认同;分类框架;边界维持;内群区分;“屯堡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24)06-0069-13

作者黄星尧,男,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吴文馨,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助理(北京 100871);卢云峰,男,汉族,重庆市巫山县人,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族群的理论范式,始终存在着“原生论”与“建构论”的分歧:族群边界究竟是由客观的、可见的、可判定的“文化差异”决定的,还是个人、群体出于特定目的建构的结果。^①关于贵州“屯堡人”的讨论,也存在类似的分歧。

* 本文为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屯堡史研究”(23&ZD252)阶段性成果。

① 刘琪:《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贵州“屯堡人”,一般是指因明初“调北征南”军事活动入黔的军事移民后裔^①,他们大多生活在距贵阳50千米到70千米,距安顺约10千米的黔中区域,该区域的300多个村庄内生活着大约20万“屯堡人”。^②作为这一区域的“外来者”,这些“屯堡人”共享着最为独特的历史记忆:先祖因“调北征南”入黔。“调北征南”,是指明初的一场大规模军事移民活动。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建立时,黔西北和云南地区仍系前元宗室梁王控制,洪武十四年(1381年)将领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远征,攻占云南后整修通往云南的各条驿道,在驿道沿线遍设卫所驻扎重兵。洪武四年到洪武三十年(1371年到1397年),明王朝在贵州地方一共设立24个卫、132个千户所和2个直隶千户所。

当代“屯堡人”在修撰族谱时,尤为重视这段历史记述。例如,安顺赵氏在族谱中记载,其原籍属江南太平府当涂县二十一都。明初,任都司统兵的始祖赵兴旺来黔,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抵安顺落籍。安顺傅氏宗族的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傅家先祖傅友德原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洪武八年(1375年)作为前锋攻克普定,进封普定卫指挥使,遂落户安顺。^③《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上御奉天门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友德等既受命”^④。傅友德被任命的官职是征南将军,不是前锋,出征时间也与史料不相符合。而且,以傅友德之地位,不可能就任普定卫指挥使这种中低级别担任。实际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友德、蓝玉就率主力回南京了,“壬午论平云南功,进封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川公”^⑤,还因功晋爵为颍国公。由此断定,屯堡傅氏家族家谱的记载与史料存在较大差异。民众通过套用历史名人来增强家族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方面说明,“文化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傅氏家族“选择性”地制造集体记忆,以塑造家族的形象和威望,满足家

①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③ 材料来源于社会调查收集。

④ 《大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宝卷录之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朔》,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⑤ 《大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宝卷录之一百六十一·洪武十七年夏四月戊辰朔》,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族认同和家族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需要。

从“屯堡人”所共享的遥远记忆来看,他们的群体边界似乎十分清晰、客观。但当代复杂的人口迁移史,又对“屯堡人”高度统一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某种挑战。“调北征南”至今已有 600 余年,在此期间,该区域还经历了明初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清初卫所制的松弛、近代战乱期间的社会动荡、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外流,这些都引发了屯堡人口的迁移与更新。可以说,今天在此生活的人口在多大比例上仍然属于当年明初军士的后裔,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①

为此,关于贵州“屯堡人”的族群边界研究也演化出“原生论”和“建构论”两种取向。“原生论”往往认为“屯堡人”的社群结构相对封闭,受到社会的外部冲击较小,因而共享了某些历史遗存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服饰和村寨建筑。^②即使经历了某些历史变迁,他们仍然身处同一文化场域,^③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的边界与竞争。^④而“建构论”则否认一种本质性、静态化的屯堡身份,强调屯堡身份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的差异表现,认为屯堡认同本质上是人们出于特定目的进行工具性建构的历史产物。^⑤基于对贵州省安顺市三个屯堡村镇的田野调查^⑥,论文试图超越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既反对把屯堡身份理解为人们出于工具性目的任意建构的人造物,也拒斥静态、封闭的原生性屯堡身份,而是将“屯堡人”身份视为由客观社会制度与主观身份归属相互交织作用构成的一种社会认知,并基于“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来细致考察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导致了“屯堡人”身份这一社会认知的形成、维持和改造,以期更好地呈现屯堡身份在历史流变过程中所具

① ③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7—18 页。

② 桂晓刚:《试论贵州屯堡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④ 方铁:《论“屯堡”文化现象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⑤ 陈志永、李乐京、梁涛:《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天龙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例》,《经济问题探索》2008 年第 7 期;黄瑾:《旅游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⑥ 2023 年 7 月,本研究组在贵州省安顺市开展社会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是安顺屯堡区域的 3 个村镇[包括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普定县马官镇、西秀区大西桥镇(含鲍家屯村等)],并对当地的村支两委干部、村贤、屯堡村民、学者、“95 后”屯堡大学生等不同群体,共计 10 余人进行访谈。调查材料还包括族谱、地戏剧本、花灯剧本、祭祖祭神活动碑文等多种民间文献。感谢贵州师范大学肖远平团队提供的前期调查资料。

有的文化性与社会性。

具体而言,论文将从社会认同理论的三个关键机制——“分类框架”“边界维持”“内群区分”来考察屯堡身份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首先,将屯堡身份这一族群边界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分类范畴,而后考察政治、经济、学术等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关于屯堡的不同分类框架。其次,作为处理群内、群际关系的一种分类框架,屯堡身份不仅是人们在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继承的分类知识,也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被人们加以改造和挪用,这就表现为:人们通过策略性地调整群内认同和群际差异的要素,不断维持着屯堡身份的动态边界。第三,屯堡身份作为一种提供自尊的社会认同资源,它所包含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主要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有利于使“屯堡人”在社会中得到更加广泛的积极评价,这也促使“屯堡人”更加积极地塑造自身的特殊性,与内群体中的其他次群体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质言之,基于这一框架,论文试图回应以下问题:“屯堡人”群体认同的背后究竟存在何种社会历史机制?有哪些主体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它们如何影响“屯堡人”身份的塑造、维持与变迁?

二、“屯堡人”的分类框架

泰弗尔(Henri Tajfel)和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社会认同理论,将社会认同视为一种认知过程,它涉及内在的比较和价值评价,主要存在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这三类机制。^①其中,社会分类是一种将社会环境系统化和秩序化的手段,它提供了一种定义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取向体系或分类框架。^②这种分类框架不仅描述了作为一个群体成员意味着什么,而且还规定了他们在给定的环境中应该表现出什么

① Turner J. C. ,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ty: Some Prospects for Intergroup Behavior"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vol. 5 , no. 1 , 1975 ;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② Tajfel H. ,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1 .

样的态度、情绪和行为。^①因而,在纷繁的社会范畴中,哪些分类框架决定了行动者的认知和行为准则,成为一个重要问题。^②不过,决定个人身份的分类框架并非唯一。随着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会选择和调用完全不同的社会范畴来定位自我。这种随环境或情境不断变化的分类框架,也存在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中。

早期“屯堡人”身份的出现,受益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国家对民族政策的落实。从20世纪初鸟居龙藏的社会调查至今,“屯堡人”的认同始终在身份框架下进行。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分类框架,通过各种社会渠道被广泛传播给群体成员。20世纪初,鸟居龙藏和伊东忠太将“屯堡人”归类为“凤头鸡”“凤头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调查将“凤头鸡”归类为黔地军队后裔形成的“汉裔民族”^③。另外,周边族群又会将“屯堡人”称为“老汉人”。^④这些关于“屯堡人”的不同称呼,本质上是将他们安排到了不同的分类范畴中,分类的变化指向了群体身份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屯堡人”的分类框架,除了受民族识别政策或特定学术群体的影响,还受到地方经济的推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指引下,“屯堡人”身份与贵州省的文化产业建设,特别是文化旅游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安顺市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都在“屯堡文化”的主旨下展开:梳理屯堡历史、抢救屯堡民俗、复兴屯堡文艺。又如,天龙屯堡在其旅游业开发之初就建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旅游开发筹建组”,在开展屯堡调查的同时搜集、整理屯堡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的“老物件”,并思考如何将资源转化到文化旅游的项目上。换言之,天龙屯堡旅游开发得以落实的关键就是论证天龙屯堡的文化独特性。2002年,天龙屯堡加入贵州新旅游联盟,主动融入贵州西部黄金旅游线,为了与同一旅游线路的黄果树、红枫湖、龙宫、马

①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② Deaux K. & Major B., "Putting Gender Into Context: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Gender-Related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4, no. 3, 1987.

③ 费孝通:《贵州族群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年4月)》,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1951—1984)·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5页。

④ 周耀明:《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岭河峡谷区别开来,天龙屯堡有意寻访和组织了屯堡民间艺术游、天龙屯堡庙会游、地戏面具展览、傩戏傩文化周等。^①当然,天龙屯堡远非单独的个例。在贵州省内,代表汉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屯堡文化,已经成为当地文旅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当然,除了外来政治、经济和学术力量的影响,屯堡所代表的身份标签或分类图示也与本地人自身的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对本地人而言,“屯堡”所代表的分类框架在农民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例如,农民工年轻时跟随亲属、同乡入城打工,年老时则倾向于回乡。由于找工作的渠道和信息来源比较单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往往依靠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工作机会。^②此时,“屯堡人”身份既是人们急于摆脱的贫穷标签,也是进入大城市的一种有效资源。不过,经济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初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没有完成身份和认同的转变。囿于社会保障机制、子女教育、劳动市场等方面的城乡区隔,农民工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家户迁移,而是在耕作与务工、家乡小城镇和沿海务工城市之间不断往返。^③在屯堡,除了少数在外经商的人,大多数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务工人员选择在中年返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城市生活中对个人技能的锻炼和个人视野的开阔,返乡农民工常常在屯堡村寨内成为精英:其中有些人通过竞选的方式担任公职,有些则在村寨的各类协会中作为骨干。因此,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而言,“屯堡人”这一身份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具有不同的意涵:年轻时,屯堡是相对于发达城市的落后乡村;年老时,屯堡则又变成相对于冰冷城市的温情乡土。

社会分类的形成及其内涵,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或个体情境。当环境或情境允许个人在某个维度上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价时,个体就倾向于用相关的社会范畴来定义自己。因此,当传统的学术框架和民族识别政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文旅产业赋予当地人全新的发展机遇,那么核心的分类框架就从“凤头鸡”“凤头苗”“汉裔移民集

① 陈志永、李乐京、梁涛:《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天龙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例》,《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7期。

②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③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团”“老汉民”等标签,逐渐转向了“屯堡人”。同样地,在不同的个人境遇中,“屯堡人”这一身份标签所对应的分类框架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年轻的本地人急于摆脱“屯堡人”这一象征着经济落后的身份,前往大城市务工;年老时,在城市中无法得到认同的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乡,成为“屯堡人”中的精英。

经由各种政治、经济、学术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屯堡认同渗透到区域开发、日常生活和节庆仪式等各个方面,在许多不涉及官方身份的场合中,“屯堡人”已经超越了其他身份标签,成为了当地最受认可的社会身份。无论是在内部群体的聚会、村寨联合聚会、家族祭祖仪式中,还是在接待外来人的调研、会议、旅游等活动中,“屯堡人”总是被视为当地人的首要身份标签,被提及、重申、回忆与强调。换言之,尽管“屯堡人”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力量形塑的分类框架,但它已然成为当地人深植内心的一种自我认同。

三、“屯堡人”的边界维持

在社会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分类框架的形成只是起点。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还因为它相对于外部群体,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相对于内部群体则分有共同的特征和命运。借助这种外部区别和内部一致,群体的边界得以维持。这一情况,在“屯堡人”中也广泛存在。从群体内部来看,“屯堡人”存在相似的语言、习俗等特征,他们大多共享与中原官话类似的“二铺话”,但却与周边方言相差较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岛”。又如,屯堡妇女不缠足,在服饰上保持安徽省凤阳县一带的独特风格。同时,从群际关系来看,明清以降,漫长的制度变革虽然推动了屯堡区域的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的速率,“屯堡人”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中始终存在某种清晰的边界。

群内一致性,不仅是某种既定的事实,也依靠群体成员对共同传统的有意维持和重塑。今天,屯堡已经形成了普遍一致的历史叙事。在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保持稳固的族群认同,是一项需要努力建设的群体事业。为此,屯堡精英常常重视族谱的修撰,试图通过文字传统来为过去的“屯堡人”和当下的“屯堡人”建立一种历史连续性,屯堡的整体性由此得以强化。

不过,为了建构一种连续的历史性,这种族谱修撰往往存在诸多“涂抹”的色彩。

这尤其表现在族谱所撰的事迹特征上:故事框架雷同,近代事件偏少。首先,对于屯堡共同体而言,族谱修撰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不如说是在制造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尽管屯堡本身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各家族的经历也大有差异,但屯堡族谱中的集体记忆大大淡化了社会变迁的痕迹,各个家族的故事在基本模式上也大致相似:南迁军士家族在明代屡建功勋,而后重视子弟教育,希望族中能人辈出,以图忠君报国、反馈乡梓。其次,一般来说,族谱通常是着重描写近事而轻轻带过远事,因为时间距离现在越近,细节越丰富。但屯堡的族谱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着重强调家族在明代的历史起点,浓墨重彩地讲述遥远的家族故事。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屯堡人”与周围族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近代事件的描绘无法凸显出屯堡的“异”,反而会彰显出它们与周围族群的“同”。因此,侧重古代而忽略近代事件的修撰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凸显自身与周边族群的“异”,重申屯堡的起源与边界。

可见,“屯堡人”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外部力量所赋予的分类框架,他们也会适时地调整自身所处的分类关系,这背后暗含了更为微妙的身份策略。例如,在族谱和村落历史的撰述中串联起“调北征南”的历史与当代民族识别的结论,又比如将传统节庆、游行等文化景观与地方政府的文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展现出一个日益混融的屯堡共同体。

当然,除了强化内部一致性,与其他族群的族际差异也是维持边界的关键。内群体的“共同”感知常常来自于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区分。由于屯堡军士家族与原居民之间因土地占用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使得屯堡地区的人在通婚上更倾向于内部通婚。如今,屯堡在方言、民间信仰、传统服饰、文艺活动等方面都与周边族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既与明初人口迁移相关,也是“屯堡人”始终与周边族群保持距离的结果。

不过,群际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屯堡区域的人群与周边族群始终都存在密切的往来。明清以降,“屯堡人”往往与周边族群在同一商贸集散区域内活动,这种经济关系延续至今,例如大西桥镇这样的商贸流转中心,其所覆盖的人群范围也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又如,周边村寨的村民也经常参加屯堡的各项传统仪式活动。屯堡的基层政府部门、村支两委等回流精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贵州省的经济发展规划当中,政府的文旅发展策略虽然同意屯堡区域和周边地域是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但在实际规划中往往要求它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关系。

可以看到,“屯堡人”与周围族群的边界并非各种冲突和矛盾的自然结果,其中也夹杂着各种有意的文化策略。本质上,“屯堡人”强化边界是为了获得内群的独特性,是为了拣选出屯堡的特异性、建构“新屯堡”的一部分,而这种尝试本身又与经济战略和区域开发紧密相关。在经济理性、历史交往与社会认同的混杂作用下,屯堡与周边族群的差异并没有导向群际关系的紧张,而是成为了整个贵州省各个文化特色区域分工合作进行区域文化建设与经济开发的一部分。

四、“屯堡人”的内群区分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根本假设是自尊假设,个体在社会中寻求自我,总是努力寻求积极的群际区分和社会认同。个体可能通过重新界定比较维度来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也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竞争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或者离开当前地位较低的群体。^①这些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一系列情况,包括对群体之间界限可渗透程度的感知,对地位差异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感知。简而言之,内群体之间的进一步区分,能够明确呈现群体成员寻求自尊和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在屯堡的寻根和祭祖活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行为特征和基本逻辑。下文将以安顺屯堡鲍氏家族的跨省寻根“省亲”活动,予以说明。

2000年,山东省济南市鲍氏家族的核心成员牵头建立了鲍氏家族史研究会,当年清明节全国鲍氏家族聚集在山东省济南市鲍家小山,尊奉共同的始祖鲍叔牙。2005年,全国鲍氏宗亲代表40人来鲍家屯参观,屯堡鲍氏将之称为“省亲”。在寻根活动中,原本的陌生人因为对历史的构造和记忆而被赋予了“血脉”的含义,对于屯堡村寨来说,参与全国范围内的鲍氏活动,无疑是“宗亲”范围的大大拓展,“血缘”在共同追溯、连接和互证记忆中被制造出来。

在这一全国鲍氏家族中,也存在更为亲密的屯堡联盟。2000年,西南地区的鲍氏梳理、交流了分支家族的历史,发现了两支有着类似的历史。大理鲍氏将先祖追溯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安徽省六安市的军士家族,而安顺鲍氏则将先祖追溯至洪武十

^① Hogg M. A., Abrams D.,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五年(1382年)安徽省歙县南迁的军士家族。同为“调北征南”的军士后裔,大理鲍氏和安顺鲍氏在聚会后一直保持密切交往。

同时,鲍氏宗亲内部也存在各种张力,非“军士后裔”的群体之间有时会形成隐隐的比较,次群体会通过反复勾勒群体边界进行积极区分。2008年11月,安顺鲍氏家族39人组成“贵州鲍氏寻根团”到安徽省歙县棠樾村祭祖,这场祭祖活动实现了与棠樾村现存鲍氏宗亲的联络,双方想象中“宗亲”的地理范围都大大拓展,补充了诸多历史细节,实现了双方对自身历史记忆的互相证明,使得许多原本来自于传说的久远记忆在互相讲述、补充、实地探访中成为被接受的历史事实。不过,在分享共同起源的同时,安顺“屯堡人”和同姓族亲在宗族活动组织、宗族能力构建等方面形成了颇具张力的关系,促使“屯堡人”更加认同自己的群体,突出自身屯堡的特殊性以区别于安徽鲍氏。

为强化内群中的区分,“屯堡人”有时会在祭祖活动中进一步凸显内群的特殊性。如2017年清明节,屯堡鲍氏数千人齐聚鲍家屯,为始祖鲍公福宝扫墓。这类屯堡村寨的宗族构建活动不局限于某一屯堡村寨的范围中,多个村寨乃至跨越省份边界的由“血缘”联络在一起的同姓人群规律性地、有组织地参与到宗族的构造过程中。在一场典型的鲍家屯清明扫墓祭祖活动中,除了各家拜祭自家的直系先祖外,鲍氏族人还会共同拜祭始迁祖考福宝公、七世祖考国臣(葵南)公、十一世祖考大千公(俗称带子老祖公)。这三位祖先被鲍氏族人认为是祖先中的先贤代表。每年的祭祖活动,以老年协会为核心的小组都要书写数篇文稿,包括为先祖重新书写祭祖祝文、祭祖活动记录、所思所感的散文等。

无论是强化宗族内部的“军裔联盟”或“屯堡网络”,还是排斥其他宗族分支的非屯堡成员,屯堡精英显然通过在各种维度上建立比较、区分内群,将先祖的碑文、口传的记忆等碎片进行了有焦点(focus)的重组和创造,最终在祭文这类民间文献中呈现出一个充满了屯堡地区文化特色和带有强烈连续性的群体记忆。透过与大理鲍氏的合作,安顺鲍氏得以进一步强化自身“军士后裔”的屯堡特质,同时通过与安徽鲍氏的区分,安顺鲍氏也得以凸显其“屯堡人”身份的自豪感。

五、总结与讨论

当代社会认同理论已经意识到,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分析这一知识的产生和变化过程,不能脱离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讨论。^①框定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图示或分类框架,都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然后经由各种渠道被广泛传播给群体成员。“屯堡人”就是这样一种关涉社会历史语境的特定认同资源,可以说,“屯堡人”从来不是一个给定的单一身份,它所指向的族群内涵与分类框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流变。从乌居龙藏眼中的“凤头鸡”到民族识别中的“老汉人”,再到今天的“屯堡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为这一族群身份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是“屯堡人”自身也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身份标签,他们也会因应自身的情感、境遇与记忆,不断调整和改写这些族群身份所具有的内涵。因此,它所包含的内群相似和群际差异既受到客观的社会力量影响,也与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归属和文化策略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分类框架,“屯堡人”的身份标签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才有意义。乌居龙藏、伊东忠太等外籍专家的“凤头鸡”和国家民族识别政策下的“老汉人”,显然指向不同的族群特质。他们本质上是将“屯堡人”安排到了不同的社会范畴中。同时,个人境遇也影响着“屯堡人”的自我认知。摆脱了传统的农商兼备、城市务工,贵州文旅产业为“屯堡人”所赋予的传统意涵催生了当地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生计方式。早年象征着贫穷落后的身份标签,在晚年回流乡村时变成了温情包容的乡土符号。新的分类方式不仅能恢复屯堡的明清景观,还能恢复屯堡作为一个同质性社区所具有的凝聚力。

“屯堡人”这一分类知识的诞生,依赖于族群边界的维持。在屯堡认同形成过程中,外部环境所形塑的分类图示,需要各种内群相似性和群际差异性来维持,群体不断延续、重塑这些异同的文化策略,也是维持这一群体边界的过程。例如,“屯堡人”通过

^① Tajfel H. , "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vol. 33 , no. 1 , 1982 .

高度相似的故事框架来编撰族谱,有意涂抹宗族历史中的近代事迹,凸显遥远的共同历史。除了这些强化内群相似性的文化策略,“屯堡人”的内部认同也来自于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区分。在与周边族群充满对抗性和联盟性的复杂比较过程中,“屯堡人”不断廓清自身与周围族群的模糊边界,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记忆、历史与身份。

“屯堡人”认同,也离不开持续的内群区分。“屯堡人”在与同姓族亲群体的交往和比较过程中,出于群体成员自尊的需求,实际上在宗族分支构建方面形成了某种竞争性的关系,促使“屯堡人”加强了对于屯堡特殊文化的建构力度,这种积极而成功的区分有助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的形成。通过祭祖这类大规模的仪式活动,地方精英对于内群团结的观念得到了自我强化并被传递给群体成员,最终将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了一套规律的、重复的认同机制。

总体来说,关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既受到客观的社会力量影响,也与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归属和文化策略密切相关。如今,屯堡的凤头鞋、梅花管簪、蓝色长衫不再是屯堡传统农业文明的遗存,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些传统元素曾一度被视为不合时宜。但如今,它们已转变为先进经济的范型。在打工经济处于劣势的背景下,“屯堡人”退回到屯堡来实现自我认知和生计方式的重建。政府对经济转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文化边疆”的理解与政策为“屯堡人”的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社会基础,随着屯堡的生计方式从农商兼备、农工商兼备向文化旅游转变,对屯堡的建构也有了稳定的方向。在国家机器的制度化努力下,各种资源被重新调动起来建立象征体系,强化和拓展了屯堡性的表述和现实,“屯堡人”在维系群体边界、进行积极区分、形塑内群认同的同时,寻觅着现代社会中屯堡的未来。

[责任编辑:张莹 张书炜]

[责任校对:罗兴贵]

On 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People in Guizhou's Tunpu

HUANG Xingyao, WU Wenxin, LU Yunfeng

Abstract: The "Tunpu people" (Tunpu is a designation for the garrison stations of Ming Dynasty in Guizhou) show a duality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 "innate" and "constructed", which was shaped by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ree – level analysis of mechanism as to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such an identification via the theory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First, the categorization framework of "Tunpu people" is a product jointly shaped by government, local elites and academics, which is featured with discrepancies i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arison with ethnic groups nearby the "Tunpu people" edited genealogies, kept revising the intra – group similarity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inter – clan discrepancy components, and dynamically maintained their own clan and group boundary. Finally, groups such as "Military – related Family League" and "Tunpu Network" were established in clan organizations so that the "Tunpu people" have improved their group self – respect through a positive intra – group distinction.

Key words: social identification; categorization framework; boundary maintenance; intra – group distinction; "Tunpu people"
